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956-2009)*

杨江华 程 诚 边燕杰

摘要:基于“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状况变迁,以及教育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与个体属性特征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代教育水平、性别与地域因素的时代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教育对向上职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时代效应存在差异,中等或大专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影响的时代效应逐渐减弱,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影响效应则日趋增强;最后,教育水平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及其阶层间的内部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优质教育获得已经成为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

关键词:教育机会 初职获得 职业流动

一、研究背景

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要的发展战略之一,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的高度重视。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据2012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已全面普及免费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99.9%,比1978年(94%)超出将近6%,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1%,是1978年(20%)的五倍多,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5%,是1978年(10%)的8倍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是1978年(1%)的30倍!^①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过去十余年的教育竞争力提升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总体教育竞争能力已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王素,2009)。

然而,在取得上述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却日益凸显。在基础教育领域,重点校制度催生的“择校热”问题,已成为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恶化的重要反映(杨东平,2006)。在高等教育领域,虽然总体入学机会在1999年扩招之后明显提升,但近来官方报道发现,农村背景、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较低,特别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明显下降;另外,在大学毕业毕业生就业难的背景下,不少农村学生开始放弃高考,“读书无用论”思潮在社会上再次升温。

如果说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中,教育获得作为个体自致性因素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流动现象的重要解释视角(Zhou et al., 1998; Xie & Hannum, 1996);那么纵向历时地看,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的总体状况如何,其不平等程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同时,教育作为影响职业生涯的重要自变量,在不同时代其作用效应如何?如何评价教育获得之于职业流动变化的分时期影响效应?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机会获得

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社会学对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分层研究,主要考察

*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11AZD022)的阶段研究成果。

①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3年8月10日,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308/155798.html)。

这一制度性的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状况。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 1998)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性别、居住地区等对城市居民的教育获得有重大影响,高干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大城市地区、男性等拥有较多的教育机会,并指出再分配时期的教育分层效应在改革后得以延续。李春玲(2003)的研究则指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教育机会分配的主要趋势是朝着平等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情形则恰恰相反,教育机会不平等趋势不断凸显,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不断提升。与之相似的结论见于李煜(2006)和郝大海(2007)的研究:李煜发现家庭教育背景是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1992年市场化改革加深之后,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机制转变为以家庭阶层背景的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为核心特征的双重模式;郝大海的研究则更清晰展现了改革前后教育分层状况相反变化的政策干预影响,认为改革后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在既有政策下相对固化、难以改变。

关于教育机会扩张与教育分层的研究,是以教育社会学领域内的两个核心假设,即MMI假设(Raftery & Hout, 1993)和EMI假设(Lucas, 2001)为讨论框架,来分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扩招所引起的教育分层变化趋势。吴愈晓(2013)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义务教育的大力普及并未带来不同社会阶层基础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下降,不平等程度在某些方面反而上升了。刘精明(2006)认为,从各类高等教育机会上看,扩招后的高等教育不平等总体趋势在下降,但其社会阶层差异仍十分明显,在地位取向明显的本科教育中,扩招后的入学机会更多惠及了优势社会阶层,而生存取向明显的成人高等教育,在扩招后则使下层社会群体更多获益。李煜(2006)的研究也发现,管理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优势在扩招后增大。与此类似,李春玲(2010)的研究分别证实MMI假设与EMI假设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基本适用,认为大学扩招并未降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城乡和民族不平等,并且不同等级高等教育机会(专科与本科)的阶层、城乡差距更加明显。

综上,已有研究指出:在市场转型与教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家庭背景是影响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是教育分层研究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但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改革进程有不同的阶段,教育领域内的政策改革方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鉴于此,本文将改革开放至今不同时期的体制政策变迁为背景,比较分析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家庭背景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效应变化,相关的假设如下:

假设1: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假设2: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机会的正向影响随时代渐进而不断增强。

(二)教育、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

社会学界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教育与职业获得研究,最有影响的当属倪志伟(Nee, 1989)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在该理论中,他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假设”,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对于个人经济回报的作用日趋式微,而教育等人力资本要素的经济回报作用则明显提升。这一假设提出后便引起诸多争议,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经验研究的发现。

一部分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假设”。如边燕杰等人(Bian & Logan, 1996)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中,政治资本对个人经济回报的影响作用并未在市场转型中降低,与此同时,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也在上升。周雪光(2000)的研究也发现,教育对于个人经济收入的提升作用在改革以后逐渐增强。吴晓刚(2002)、赵伟等人(Zhao & Zhou, 2002)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从工作单位类型来看,教育在私有部门的经济回报要高于在国有部门的经济回报。

另一部分研究则与“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假设”的观点相左。如谢宇等人(Xie & Hannum, 1996)的研究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城市中的人力资本回报并没有随着市场改革开放而提升。吴晓刚等人(Wu & Xie, 2003)则明确质疑了教育在市场部门中回报率必然较高的普遍观点,指出市场改革对个人收入回报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工作单位,而不是教育。

笔者认为,尽管上述不同观点各有道理,在经验层面也都有相关依据,但似乎都未充分考虑到一个主要问题,即市场转型中教育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效应。从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时段来看,其差异

可能变动较大,而非简单的增强或减弱。同时,就转型期的教育与职业流动的影响关系而言,已有研究也未给予充分关注。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实证分析的资料依据,上述研究所依据的调查数据大都是1990年代中期前后(甚至更早),此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教育对职业选择流动的作用效果尚处于形塑阶段。而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化程度逐渐增强,教育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作用效果会与之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中期)有很大不同。

以倪志伟的理论预设,市场体制意味着教育对人们职业选择及经济收入的作用应该是逐渐增强的,但其理论之所以被已有研究部分证伪,关键在于对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未作界定说明。比如,如果没有刺激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政策改革,教育水平与职业获得的正向关系可能就无法显现。因此,本研究将比较验证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教育水平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贡献效果变化,相应的假设有:

假设3:在市场化进程中,教育水平对初职获得的正向影响愈加重要,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对初职地位获得的作用效应越显著。

假设4:在市场化进程中,教育水平对促进职业流动具有积极意义,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对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作用效应越显著。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09年7月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09)。该调查数据收集了有关个人职业获得与流动的丰富信息,以及本研究所需的被访者家庭背景信息,研究涉及的核心变量描述及其样本比例详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变量	统计量	变量	统计量
被访者受教育水平(%)		被访者父代所在单位的级别(%)	
初中及以下	28.3	中央部门	9.2
高中及同等学历	34.8	省级部门	17.1
大专	17.0	市属部门	25.7
本科及以上	19.9	县级及以下部门	12.7
被访者父代受教育水平(%)		无主管部门	8.3
小学及以下	36.5	其他	14.7
初中	19.4	被访者进入职场前已去世	12.3
高中及同等学历	18.3	被访者父代的职业类型(%)	
大专及以上	10.4	管理精英	4.3
缺失 ^b	15.4	技术精英	4.5
被访者父代政治面貌(%)		普通劳动者	78.9
非党员	60.9	被访者进入职场前已去世	12.3
中共党员	25.7	被访者初始职业的类型(%)	
缺失 ^b	13.3	管理精英	12.0
被访者父代所在单位性质(%)		技术精英	16.8
体制内	58.5	普通劳动者	71.2
体制外	9.3	被访者初业所在单位性质(%)	
其他	20.0	体制内	70.2
被访者进入职场前已去世	12.3	体制外	27.1

续表 1

变量	统计量	变量	统计量
其他	2. 7	精英阶层内部流动	3. 9
被访者初职获得所处的时代(%)		精英阶层→普通阶层	10. 8
改革前(1956 - 1978)	33. 3	被访者的性别(%)	
改革初(1979 - 1992)	27. 7	女性	53. 1
改革中(1993 - 2001)	20. 1	男性	46. 9
世贸后(2002 - 2009)	18. 9	被访者的户籍(%)	
被访者是否发生职业流动(%)		农业户口	10. 3
未流动过	54. 2	城市户口	89. 7
流动过	45. 7	被访者所在区域(%)	
缺失	0. 1	内地	48. 2
被访者的职业流动模式(%) ^c		沿海	51. 8
普通阶层稳定不变	57. 5	被访者年龄	
精英阶层稳定不变	11. 8	均值	43. 1
普通阶层→管理精英	11. 6	标准差	13. 3
普通阶层→技术精英	4. 5		

注:a. 总样本为 7047。b. 缺失主要由于被访者工作时,父亲已去世,而没有进一步了解父亲的相关信息造成。
c. 此处统计的为发生过职业流动的被访者。管理精英到技术精英,以及技术精英到管理精英的流动较少,合并为“精英阶层内部流动”。两类精英阶层到普通阶层的比重很低,合并为“精英阶层到普通阶层”。d. 为简便起见,改革开放时代分期在各数据表中一律简称为“改革前”、“改革初”、“改革中”与“世贸后”。

本研究的第一个因变量是教育获得,体现为初中(及以下)教育、高中教育、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四个层次。第二个因变量是初职获得,为便于分析,我们将职业类型合并为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和普通劳动者三类,并将初职单位类型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第三个因变量是职业流动,包括是否流动与职业流动模式两个方面,其中职业流动模式主要考察普通阶层向精英阶层(管理或技术)的向上流动、精英阶层向普通阶层的向下流动,以及精英阶层内部的交互流动。

由于本研究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呈现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不同影响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子代初职地位以及职业流动的作用效应的变化状况,所以对改革开放阶段进程按照重大历史事件划分为:改革开放前(1956 - 1978)、改革开放初期(1979 - 1992)、改革开放中期(1993 - 2001)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 - 2009)。

本研究的自变量重点考察被访者家庭背景的相关信息,在问卷中具体体现为:被访者父亲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党员与非党员)、单位类型(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主管级别(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及以下)与职业类型(管理精英、技术精英与普通劳动者)。这些变量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所显示的最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变量。

本文需要使用两种统计模型。我们以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被访者是否发生职业流动,以及他们对两种单位类型的职业选择,以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居民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与流动的主要变量因素。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改革开放分期效应

表 2 - 1 报告了各主要变量对三类不同教育水平获得(以初中以下阶段为参照项)的影响程度。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居民不同阶段的入学机会都呈上升趋势,这与三十余年的教育总体发展趋势相吻合。在各主要变量中,除了父亲的单位类型外,其余家庭背景变量都对子代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父代的教育水平作用尤为突出。从高中、大专和本科三个教育水平层次看,父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每个阶段相应的受教育机会就越多。父亲的政治面貌和职业类型与子代受教育机会之间都呈正相关关系,党员身份与精英阶层的子女,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且获得较高层级教育机会的优势更明显。性别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在大专阶段以后开始显著,并随着学历层次提高,男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而与之相对,高中阶段则不显著,这表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的性别平等化效应在高中阶段得到了延续。区域因素的影响效果与性别变量一致,即越是较高水平的教育阶段,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的居民相较于内陆城市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就越多。

表 2-1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

	高中教育/初中及以下		专科教育/初中及以下		本科教育/初中及以下	
父亲教育水平(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0.538 ***	(0.090)	0.848 ***	(0.116)	0.693 ***	(0.124)
高中	0.825 ***	(0.113)	1.573 ***	(0.130)	1.677 ***	(0.135)
大专及以上	1.254 ***	(0.190)	2.077 ***	(0.204)	2.651 ***	(0.202)
父亲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中共党员	0.232 **	(0.088)	0.528 ***	(0.104)	0.589 ***	(0.108)
父亲单位类型(参照:体制内)	-0.163	(0.150)	-0.094	(0.175)	-0.177	(0.180)
父亲单位主管级别(参照:中央级)						
省级	-0.261	(0.144)	-0.523 **	(0.172)	-0.297	(0.181)
市级	-0.279 *	(0.136)	-0.493 **	(0.163)	-0.348 *	(0.173)
县级及以下	-0.413 **	(0.156)	-0.597 **	(0.188)	-0.380	(0.198)
无主管部门	-0.601 **	(0.207)	-0.872 ***	(0.249)	-0.428	(0.255)
其他	-0.675 **	(0.208)	-0.821 **	(0.253)	-0.793 **	(0.263)
父亲职业类型(参照:管理精英)						
技术精英	-0.375	(0.318)	-0.617	(0.339)	-0.720 *	(0.337)
普通劳动者	-0.502 *	(0.246)	-0.990 ***	(0.262)	-1.326 ***	(0.261)
性别(参照:女性)	0.123	(0.064)	0.277 ***	(0.081)	0.648 ***	(0.084)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0.709 ***	(0.076)	0.958 ***	(0.109)	1.116 ***	(0.119)
改革中	0.743 ***	(0.106)	1.912 ***	(0.127)	2.437 ***	(0.133)
世贸后	1.112 ***	(0.133)	2.663 ***	(0.150)	3.566 ***	(0.153)
户口(参照:农业户口)	1.204 ***	(0.118)	1.913 ***	(0.146)	3.332 ***	(0.185)
地区(参照:内陆地区)	0.042	(0.065)	0.216 **	(0.083)	0.489 ***	(0.085)
截距项	-0.742 *	(0.300)	-2.700 ***	(0.338)	-4.802 ***	(0.365)
N	7047					
pseudo R ²	0.149					
ll	-8075.6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为呈现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获得在不同改革开放阶段的效应变化,我们采取了分时段检验父代教育水平与政治身份对子代教育影响的变化趋势。表 2-2 中的数据显示,总体上看,父代的教育水平在各个时段都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父代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相应阶段的教育机会就越多,因此假设 1 得到了验证。但从变化趋势上看,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教育影响的贡献效应在改革开放前期和初期相对平稳,而在改革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贡献效应凸显,在较高层级的教育机会上,父代教育程度越高,贡献效应越明显,假设 2 由此被验证。这种以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2002 年)为拐点的波动趋势,恰好与我国高校扩招(1999 年)的政策背景有关,这意味着,扩招后新增的高等教育机会,被那些拥有较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子代所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集中趋势开始呈现。父代的党员身份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在改革开放前后以及改革开放初中期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变化并不显著,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父代的党员身份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开始消失。父代党员身份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的弱化,意味着党员身份的政治资本效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渐降低。

表 2-2 分时代考察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高中/初中及以下				
父亲教育水平(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1.337 *	1.645 **	2.482 ***	3.174 ***
高中	2.469 ***	1.681 **	2.822 ***	5.979 ***
大专及以上	4.456 ***	4.212 ***	4.192 **	11.10 **
父亲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中共党员	1.515 **	1.584 **	1.586 *	0.954
大专/初中及以下				
父亲教育水平(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2.258 ***	2.086 ***	3.131 ***	3.944 ***
高中	3.454 ***	4.274 ***	4.851 ***	14.72 ***
大专及以上	8.986 ***	12.146 ***	13.77 ***	35.22 ***
父亲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中共党员	2.777 ***	1.904 ***	2.306 ***	1.187
本科及以上/初中及以下				
父亲教育水平(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1.539	2.169 **	2.570 ***	2.541 ***
高中	6.078 ***	4.557 ***	5.573 ***	10.38 ***
大专及以上	14.18 ***	15.57 ***	31.69 ***	58.28 ***
父亲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中共党员	1.466	2.795 ***	2.146 ***	1.448
N	2344	1955	1413	1335
pseudo R ²	0.039	0.051	0.069	0.074
ll	-2592	-2368	-1817	-161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教育水平、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

表 3-1 报告了两部分信息:一是教育水平与初职获得的关系。数据显示教育对进入精英阶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教育投资对改变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相对于体制内,教育水平对体制外就业影响比较显著,但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其影响程度相对较低。教育水平提高对体制外就业影响降低的原因,可以从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体制内偏好”进行解释。但反过来,教育水平提高并不意味着体制内就业机会的必然增加,已有研究表明,能否进入体制内职业,还与个人的家庭背景有较大关系(李春玲,2014)。二是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的关系。统计结果表明,教育对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对职业向上流动具有正向效应,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普通阶层向精英阶层的流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显著结果是,教育对精英阶层内部的相互流动以及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稳固均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教育程度越高,其作用效果越加显著。

为了呈现改革开放时段进程对教育水平与职业获得的关系影响,我们在表 3-2 中分析了教育、时代及其交互相应下的初职地位获得。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代,教育对进入普通劳

动者、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等不同职业的总体作用效果几乎没有变化,相反高中及大专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的作用影响,随着改革深入而不断减弱。这可能意味着,中等及大专教育文凭相对于职业的含金量在改革进程中并未提升,相反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本科阶段的教育对于进入精英阶层的影响较为稳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其效果最为明显。数据还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其初职地位相对也就越高,好的教育(本科及以上)在不同时代对较高职业获得依然具有积极的正向意义。总之,实证结果不能充分支持假设3,但这一结果却在情理之中,随着我国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中初职的学历门槛相应逐渐增高,所以会现场中等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效应降低的趋势,但优质的教育学历(本科及以上)依然具有职业市场优势。

为了揭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教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变化趋势,我们在表3-3中分析了教育、时代及其交互相应下的职业流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不同时期的样本数据分布以及实证分析的简洁考虑,我们在此将职业流动模式由前文的6种调整为4种,即上层不变(精英阶层稳定不变)、下层不变(普通阶层稳定不变)、向上流动(普通阶层到精英阶层)和向下流动(精英阶层到普通阶层)。由于我们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教育与职业流动的时代效应可能和年龄效应相互干扰影响,所以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年龄”变量以相互控制,并且选取了“下层稳定”作为职业流动分析的参照项,以更准确呈现出教育对职业流动的分时期影响效应。交互项的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教育对职业流动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教育获得对职业流动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效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假设4未被验证。

表 3-1 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模型整体统计信息
初职获得(参照项:普通劳动者)				N = 7029; pseudo R ² = 0.103; ll = -5015.2
管理精英	1.058 ***	1.999 ***	2.702 ***	
技术精英	0.891 ***	1.713 ***	2.626 ***	
初职单位类型(参照项:体制内)				N = 6840; pseudo R ² = 0.389; ll = -2470.1
体制外	0.499 ***	0.404 ***	0.286 ***	
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N = 7020; pseudo R ² = 0.034; ll = -4673.9
流动	1.128	1.213 *	0.967	
职业流动(参照项:普通阶层稳定未变)				N = 3198; pseudo R ² = 0.112; ll = -3761.8
精英阶层稳定不变	4.770 ***	19.98 ***	63.47 ***	
普通阶层→管理精英	2.901 ***	10.33 ***	12.46 ***	
普通阶层→技术精英	2.236 **	8.481 ***	20.66 ***	
精英阶层内部流动	5.545 ***	25.41 ***	109.4 ***	
精英阶层→普通阶层	2.600 ***	5.566 ***	8.492 ***	

注:各模型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户口、地区、父代教育水平、入职时代等。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3-2 教育、时代及其互动条件下的初职地位获得

	全样本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交互效应
管理精英/普通劳动者						
教育水平(参照:初中及以下)						
高中	1.059 ***	1.146 ***	1.018 ***	1.259 **	1.456	1.041 ***
大专	2.003 ***	1.991 ***	2.300 ***	1.690 ***	2.358 **	1.898 ***
本科及以上	2.711 ***	2.355 ***	2.977 ***	2.563 ***	2.867 ***	2.260 ***

续表 3-2

	全样本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交互效应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0.171					0.015
改革中	0.603 **					0.576
世贸后	0.360					-0.353
高中*改革初						0.015
高中*改革中						0.324
高中*世贸后						0.647
大专*改革初						0.454
大专*改革中						-0.024
大专*世贸后						0.885
本科及以上*改革初						0.750 *
本科及以上*改革中						0.490
本科及以上*世贸后						1.275
_cons	-5.638 ***	-14.247 *	-5.304	-10.609 **	-12.775 ***	-5.822 ***
技术精英/普通劳动者						
教育水平(参照:初中及以下)						
高中	0.896 ***	1.092 ***	0.737 **	0.595	0.919 *	1.003 ***
大专	1.723 ***	1.700 ***	1.853 ***	1.219 ***	1.643 ***	1.670 ***
本科及以上	2.647 ***	2.188 ***	2.906 ***	2.155 ***	2.562 ***	2.158 ***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0.212					0.132
改革中	0.309					0.475
世贸后	0.187					0.309
高中*改革初						-0.173
高中*改革中						-0.119
高中*世贸后						-0.115
大专*改革初						0.327
大专*改革中						-0.097
大专*世贸后						-0.020
本科及以上*改革初						0.876 **
本科及以上*改革中						0.368
本科及以上*世贸后						0.474
_cons	-2.233 **	-16.600 **	-7.045 *	-7.941 *	-5.410 ***	-2.330 **
N	7029	2342	1953	1406	1328	7029
pseudo R ²	0.103	0.103	0.125	0.107	0.113	0.105
ll	-5017	-1650	-1289	-1038	-973	-500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3 教育、时代及其互动条件下的职业流动

	全样本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交互效应
上层稳定/下层稳定						
教育水平(参照:初中及以下)						
高中	4.698 ***	4.814 ***	4.303 ***	5.246 **	6.321 ***	4.642 ***
大专	20.501 ***	23.510 ***	27.907 ***	18.574 ***	27.649 ***	20.219 ***
本科及以上	77.514 ***	39.432 ***	36.787 ***	105.108 ***	102.906 ***	32.897 ***
年龄	1.058 ***	1.108 **	1.114 ***	1.071 ***	1.040 ***	1.061 ***

续表 3-3

	全样本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交互效应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0.903					0.999
改革中	0.657					0.566
世贸后	0.678					0.424
高中*改革初						0.866
高中*改革中						1.098
高中*世贸后						1.448
大专*改革初						1.146
大专*改革中						0.863
大专*世贸后						1.651
本科及以上*改革初						1.019
本科及以上*改革中						2.917
本科及以上*世贸后						3.907
向上流动/下层稳定						
教育水平(参照:初中及以下)						
高中	2.389***	4.346**	1.859*	2.281*	2.529***	4.259**
大专	8.424***	13.944**	11.154***	7.122***	8.267***	13.245**
本科及以上	13.075***	9.520*	7.919***	11.598***	13.680***	8.405*
年龄	1.023***	1.036	1.051**	1.037**	1.013	1.024***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1.104					1.651
改革中	0.770					1.119
世贸后	0.679					0.822
高中*改革初						0.416
高中*改革中						0.520
高中*世贸后						0.607
大专*改革初						0.749
大专*改革中						0.505
大专*世贸后						0.676
本科及以上*改革初						0.871
本科及以上*改革中						1.255
本科及以上*世贸后						1.780
向下流动/下层稳定						
教育水平(参照:初中及以下)						
高中	2.458***	1.704	1.655	3.889***	2.314**	1.661
大专	4.964***	15.232**	4.299*	4.251**	5.421***	14.196**
本科及以上	8.666***	0.000	5.612**	9.133***	9.563***	0.000
年龄	1.013	1.034	1.002	1.006	1.017	1.014
入职时代(参照:改革前)						
改革初	1.270					1.474
改革中	1.474					1.106
世贸后	1.286					1.206

续表 3-3

	全样本	改革前	改革初	改革中	世贸后	交互效应
高中 * 改革初						1. 011
高中 * 改革中						2. 371
高中 * 世贸后						1. 388
大专 * 改革初						0. 312
大专 * 改革中						0. 307
大专 * 世贸后						0. 376
本科及以上 * 改革初						1. 91e + 05
本科及以上 * 改革中						3. 23e + 05
本科及以上 * 世贸后						3. 19e + 05
N	3151	202	510	682	1757	3151
pseudo R ²	0. 114	0. 135	0. 125	0. 116	0. 110	0. 117
ll	- 3181	- 196	- 531	- 682	- 1752	- 3170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 JSNET2009 数据,本文对改革开放不同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趋势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作为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最重要因素,其中父代教育水平的作用效应最为显著,不仅对子代各教育阶段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且在改革的不同时代,其影响效应的递增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以 2002 年(即高校扩招后)为分水岭,形成两个鲜明的波动变化对比。这一特征与性别、户籍与地区等背景性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效果上相似,即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些因素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总体影响效应经历了改革初中期的局部波动起伏变化后,从本世纪开始逐步凸显。

基于此,本文的第一个主要结论是:先赋性身份因素(家庭背景与个体先赋属性特征)所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并未被降低,反而在外部政策干预下,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2002 年的分水岭效应源于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例外情况,即父代的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随时代渐进而不再重要,这说明作为自致性身份象征的教育获得,已经不再取决于家庭背景的政治性身份,而是更多与家庭背景中的认知性、文化性、地域性因素有关。

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机会的扩大(无论是基础教育领域还是高等教育领域),并未明显改变教育分层的客观现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分化。由于导致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诸要素中,家庭背景(阶层背景)具有持续性的作用效应,所以本研究结论的一个政策引申讨论是:未来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调整方向,应从过分注重对教育机会总量提高及时转向对阶层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上,特别是建立改善中低社会阶层子女的教育获得补偿政策机制应是主要努力方向之一。

本文研究表明,教育获得对于初职地位以及职业流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进入精英阶层的职业。同时,教育水平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及其阶层间的内部流动具有正向的影响,教育获得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维护自身地位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然而,从改革时段效应来看,相对于本科学历而言,大专与中等程度教育水平对进入精英职业的影响随着时代渐进而减弱。这说明教育机会的扩张并未带来社会职业流动机会的必然增加,相反其后果有时可能是负面的,这恰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感知的“文凭贬值论”相符。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教育与职业获得之间的悖论现象,来源于中国经济产业转型的迟缓和

学历教育机会的迅速扩张(特别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政策)之间的矛盾,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迅速消化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林毅夫,2012),以至于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本研究结论的第二个政策引申讨论是:为促进教育与职业获得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未来教育政策的引导方向应是通过扩大职业教育机会以培育形成中国经济产业转型所急需的大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而非盲目地扩大学历教育(特别是大专与本科较低层次的教育)的数量机会。

参考文献: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春玲,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4,《“最难就业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李培林等主编:《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精明,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第3期。
- 王素,2009,《中国教育竞争力报告:中国教育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中国教育报》11月27日。
- 吴愈晓,2011,《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2013,《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杨东平,2006,《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 Bian, Yanjie & Logan, Joh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 Lucas, S.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6).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 Raftery, A. E. & Hout, M.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66.
- Xie, Yu & Hannum, Emily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4).
- Wu, Xiaogang 2002,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80(3).
- Wu, Xiaogang & Xie, Yu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 Zhao, Wei & Zhou, Xueguang 2002,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9.
-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4).
- Zhou, Xueguang, Moen, Phyllis & Tuma, Nancy B. 1998,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1(3).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芝梅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ts Impact on Career(1956 –2009)

..... *Yang Jianghua , Cheng Cheng & Bian Yanjie (1)*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Survey of Social Network and Job Seeking in Chinese Big Cities”(JSNET200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 mobilit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amily background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have continuous positive impa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father’s generation, gender and region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time influence effects.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up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its time effect. The time effect of college diploma on entering into elite occupation has decreased gradually, while the impact effects of bachelor & above degrees have become obvious increasingly. Finally, educational level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stability of elite class’s own status and inter-class mobility, the attainment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realize reproduction of elite class’s social status.

Keywords: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irst Occupation Attainment Occupational Mobility

College Students’ Status of Life Attitude and the Transition Strategy *Li Jie(12)*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2290 questionnaires conducted in 10 universities from 8 provinces and cities, we have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life attitude is positive, optimistic and enterprising. Besides major, many factors (such as gende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whether one child, whether student cadre, grade, family finance, health status, love experience, political status, growth environment, enrolled school, etc.)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life attitud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transition in life attitude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discarding educational prejudice and setting up right educational idea; paying attention to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and using scientific educational way; emphasizing ideal & education in mental health and setting up reasonable education content;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and cultivating harmoniou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Life Attitude Present Situation Transition Strategy

The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easa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form in Floating Population System

..... *Liu ChengBin & Wang Shuting (2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easa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level between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and those who haven’t. For children whose parents are both floating,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much more prominent. According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he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easants can lead to lower quality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 hence induce lower sense of family attachment. Meanwhile, the decrease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ense of family attachment would induce higher crisis in mental health together. The data also indicates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easants, experience of